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一场军事暴动爆发于这座历史名城，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但是，第一支人民的军队却由此宣告诞生。

## 一、起义爆发前的国内形势

###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反对袁世凯称帝，再到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曾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反动军阀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斗争基本上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屡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依靠军阀去打倒军阀是不可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而就在这时，传来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孙中山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22年9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与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并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等，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一些国民党地方执行机构的领导职务也由共产党人出任。以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建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形成了。

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孙中山先生致力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广东作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其地位并不巩固，盘踞在广东境内的杨希闵、陈炯明等军阀武装虎视眈眈，随时准备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鉴于这种情况，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担任主力，进行了第一次东征。经过一年的征战，彻底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全省。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广东的工农运动也在蓬勃发展。1926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共产党人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军。农民是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军，广东的农民运动开展的更是有声有色。到1926年6月，全国约90多万的农会会员中，广东省即占了2/3。农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缴地主武装枪支、惩办土豪劣绅的斗争。广东农民运动成为当时

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和各省农民运动的先导。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准备了重要条件。

##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

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东征统一了广东全境，整个广东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这时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黑暗统治之下。当时最大的军阀有两支：一支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另一支是代表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其中尤以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对广东国民政府的威胁最大。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嚣张气焰，进而统一全中国，192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北伐的方针。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军从广州出发，首先向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发起攻势。一路上，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势如破竹。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彻底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先后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在北伐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夺取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关键战斗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赫赫的战功，并因此而被誉为“铁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各地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北伐军军威指处，所向披靡。而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1927年1月，汉口、九江两地的人民，在经过顽强的斗争后，收回了当地的英租界；经过两次起义失败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等的领导下，于3月举行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最终击溃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暴动的胜利。

面对大好的革命形势，工农大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以为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统治从此可以结束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出于自身的利益，不能容忍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开始走上背叛革命，投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怀抱的道路。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涌动着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暗流。

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期间，就有人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个“阴谋”，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居正等14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开除国民党中执委中的共产党人等反革命决议。

在北伐前的1926年3月，当时还披着“左”派外衣，以坚定的革命者自居的蒋介石利用当时他任国民政府军事总监和黄埔军校校长的地位，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逮捕了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之后，又扣留了第一军中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并强迫他们退出了第一军，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以“消除误会，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并剥夺了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权利。由于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中反动势力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立场，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为其日后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创造了条件。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同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且决定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分两批北上武汉。在第二批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委员北上途经南昌时，蒋介石突然扣留了他们，并攻击武汉国民政府是非法的，污蔑共产党人在压迫国民党员，狂叫共产党“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至此，一直以左派自居的蒋介石逐渐露出了自己的真正面目，开始为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制造舆论。与此同时，他指使歹徒在江西、安徽等地摧残农运，捣毁工会，打击仍在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地方执行机构。1927年3月6日，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坚；11日解散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在九江攻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屠杀工农群众；23日又在安庆大开杀戒。蒋介石高举着屠刀，从赣州、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向上海。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热烈欢迎。大资产阶级表示，为了“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落共产党之手”，希望蒋介石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并且答应为蒋提供数千万元的经费。而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则表示，将通过租界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驻扎在上海的3万多外国军队将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人民可能的反抗。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怂恿，使蒋介石受宠若惊，由此更加加快了其反革命的步伐，开始积极策划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活动。

4月2日，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等8人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在会上，由吴稚晖提出了一个所谓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为蒋介石发动政变制造舆论。4月3日至5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古应芬等10余人连续召开反共秘密会议，决定在4月15日前“清党”，同时正式“分共”。蒋介石负责东南——上海方面的屠杀，古应芬到广东去策划反革命政变，而汪精卫则去武汉进行分裂革命的活动。4月8日，蒋介石又授意白崇禧、吴稚晖、陈果夫等人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

面对日益嚣张的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毫无警惕。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企图日趋明显，工人群众多次报告反动派将袭击工人，中外报刊也早已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报道的情况下，陈独秀居然在4月5日与汪精卫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不仅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并要革命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要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陈独秀的所作所为起到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掩护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烟幕弹的作用。

4月11日，在蒋介石的直接布置下，二三百名流氓歹徒在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家中集合。12日凌晨，这些冒充工人的流氓打手开始在一些地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准备不足而不敌歹徒打手。尔后，反动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以欺骗和强迫的手段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位于闸北湖州会馆的总工会也被反动派占领。为了反击敌人的这一暴行，4月12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要求反动派归还枪支，惩办凶手。愤怒的群众从反动军队的手中夺回了总工会会所。

4月13日，上海的纱厂、电车工人和海员、店员20多万人举行罢工，抗议反革命分子的暴行。下午1时，罢工群众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前往位于宝山路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队突然从各个里弄里冲出，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当时正值天降大雨，被害工人群众的鲜血和着雨水流淌，染红了整条宝山路。与此同时，在上海其他地区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也遭到了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一切革命团体。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员或革命者的就会被捉、被杀，甚至被腰斩、凌迟处死。一时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次大屠杀中，有五千多名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害，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就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紧随上海“四一二”屠杀之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包括肖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害。

与南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相呼应，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包围并袭击了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了苏联外交官和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4月28日，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将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秘密处死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得手后，于4月18日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反动政权成立后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并且明令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0余人。紧接着，国民党南京中央决定成立“清党委员会”，立即在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开始“清党”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分立的局面。这其中只武汉国民政府还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权。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政府曾表现出了极大的义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通电全国将蒋介石捕获按反革命罪惩治。当时的武汉成为中国革命者和革命运动汇集的中心。但是，由于武汉政府是由与大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之流在起主导作用，这就使武汉政权所表现出的革命只能是暂时的。从1927年5月开始，武汉国民政府开始迅速地向“右”转。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大屠杀“分共”计划，15日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叛变革命。他们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彻底分裂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全国笼罩在一片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联合的统一战线最终的破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相连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被革命吓慌了神的民族资产阶级则附和了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为。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被看成了同盟者，而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则被看成了仇敌。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 二、南昌起义

### （一）革命力量集结南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烈火更是扑不灭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后，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新的斗争方式来解决，中国革命必须以新的斗争形式进行。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中旬，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了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准备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准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由于考虑到我党能够直接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多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而这些部队这时都以东征讨蒋之名随第二方面军向九江、南昌一带行动。因而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南昌地处赣江下游，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在九江、南昌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我党可以掌握或影响的部队，能够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3万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叶挺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周士第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南昌铁路沿线的马回岭车站，这两支部队的兵力加起来有近万人；他们的前身就是在广东出发时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号称“铁军”。它原有队伍的士兵大都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的产业工人，军官则大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而政工人员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北伐战争发展到湖南、湖北后，这两支队伍里又补充进了许多两湖农民协会和工会、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因此是士气最高、纪律最好、最有觉悟的部队，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事部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

二是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当时这支部队是刚刚从鄂东开到九江的，兵力大约有两万人。贺龙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表示要坚决跟党走。他为人豪爽、忠诚、可靠，而且共产党人周逸群这时在这支部队任党代表，并收留了从武汉和两湖其它地区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300多人，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

三是共产党人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在辛亥革命后曾在

云南护国军蔡锷的部队里担任过旅长，因其作战机智勇敢，在滇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是滇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因此朱德便奉中央指示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创办了军官教育团。当时除已毕业者外，在校的学员有3个连，约300余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朱德这时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警察也归他指挥。还有共产党人方志敏开办的南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学员600多名。

此外，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还有卢德铭、罗荣桓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分校的学员，他们从武汉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警卫团后来开到江西修水，成为秋收起义的一支力量，武汉军政分校则被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了广州，后来在叶剑英的率领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而这时，南昌城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朱培德第五路军的主力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扎在吉安、进贤一带，而朱培德本人当时正在庐山与张发奎等人一起商讨反共事宜，南昌城里只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和6个团，共计1万余人，从力量对比上看，革命武装的力量远超过反革命武装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武汉政府反共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变得越来越严峻。亲武汉汪精卫政府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等在九江、庐山一带准备集结3个军，阴谋把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调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消灭之。当时的军事形势十分紧急，可以说是非我歼敌，即敌歼我。乘敌人的阴谋还正在策划之中，从为了保存这仅有的武装力量的角度出发，也必须举行起义。

全国解放后，贺龙在回忆当时的紧急形势时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好，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划子（即小船）上开了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是否考虑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向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这个在小划子上召开的三人会议对起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叶剑英当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比较早地获悉了张发奎、朱培德企图将叶挺、贺龙诱骗上庐山并加以扣压，然后消灭这支革命武装的阴谋。在这危急关头，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迅速将敌人的阴谋告诉叶、贺二人。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小划子上的磋商和决定是十分及时的。从7月25日开始，叶挺、贺龙的部队开始沿南浔铁路一批批由九江开向南昌。7月27和28日，叶、贺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的指挥部设在朱培德总部和伪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内；叶挺的指挥部则设于百花洲畔的心远大学内。至此，参加起义的主要部队顺利地移到了集合地点，完成了集中任务。

与调动部队完成的同时，起义的其它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7月25日，周恩来在陈赓的伴随下，已经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住进了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接着，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徐特

立、林伯渠和李立三、谭平山等人也相继离开武汉到达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艰劳，于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在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党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然后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并做出了相应的战斗部署：贺龙的第二十军负责消灭位于章江路的朱培德总指挥部，伪省政府和牛行车站及永和门附近的敌人；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负责消灭顺化门、贡院、天主堂和新营房一带的敌人并攻占敌军弹药库；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负责监视进贤门和小花园一带的敌人。会议决定，7月30日晚上发动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位于南昌西大街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亲自找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谈话，把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了他，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激动而坚定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随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之后，又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张而有计划的进行着。就在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南昌。7月29日，当时在九江的张国焘就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连两次给起义前敌委员会发电报，说“暴动要慎重”，并提出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举行起义。根据当时的形势，前委决定起义仍按原计划进行，没有理睬张国焘的电报。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前敌委员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说：“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否则不能动。”还说：“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绝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虽然前委作出了起义不能推迟的决定，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的时间不得不后延。前委最后决定将起义的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4时。

贺龙在接受了起义任务后，在7月30日下午召开第二十军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一、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重新竖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二、我们在一块很久了，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三、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与此同时，叶挺也召开了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前委关于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提出了明确的战斗任务：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城关内外的反革命军队。

7月31日是星期天，各起义部队都接到了禁止外出的命令，准备迎接战斗任务。晚上9点左右开始行动部署，10点半南昌城里开始戒严。起义部队的口令是“统一河山”。参加起义的官兵们在脖子上系上了红领带，臂上缠上白毛巾，把贴有红十字的电筒或马灯放在身边。他们有的就驻在敌人营房隔壁，悄悄地准备停当后又躺下装睡；有的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靠近敌人的房屋和街道；有的就地筑起临时工事；有的集合在驻地等待着开赴战斗地点。

所有的起义部队都在准备着与敌人的拼死搏杀，而这时朱德却在按照前委的指示，用另一种方式为起义做着准备。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驻有



两个团，这两个团是滇军的主力，也是起义军的劲敌。如果能在起义开始时，使这两个团失去指挥，那将对起义极为有利。朱德便利用他曾是滇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和在滇军中的声望，于31日下午在国民党南昌市长李尚庸的家里大办酒席，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这顿饭一直吃到深夜11点钟，使这两个团长与其部队无法联系，起义一打响这部分敌人即迅速地被歼灭。朱德以其大智大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任务。

周恩来这时在前敌委员会亲自领导和指挥着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离起义的时刻越来越近了。突然前敌委员会的电话铃声大作，贺龙报告说，晚上10点多钟，第二十军的一名士兵发现该部一个姓赵的副营长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朱培德的指挥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周恩来和前委果断地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至凌晨2时。

## （二）八一枪声

1927年8月1日零时，起义的命令迅速传达到了起义军的每个官兵。凌晨2时，随着三声枪响战斗开始了。接着，密集的枪声震撼了全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所吓倒，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进行革命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战斗开始后，贺龙的第二十军的任务是攻打并消灭设在旧藩台衙门的朱培德指挥部和警备团，以及驻伪省政府的警卫部队与第九军的两个团。由于敌人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告密，在这里已有所准备，因此战斗一开始就进行的十分激烈。敌人利用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

此时，担任主攻任务的起义部队尚未赶到，情况十分紧急。在贺龙、刘伯承和周逸群的指挥下，起义军的机枪手奋不顾身地从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的向敌人射击，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了下去。起义军则乘势冲了进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把敌人压缩在院内，紧紧地包围了起来，使敌警备团走投无路，不得不举手投降。敌第九军的两个团则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在二十军教导团的突然而迅猛的攻击下，一个团被起义军缴械，另一个团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被歼。

第二十四师在周恩来和叶挺的指挥下，在起义的战斗一打响，便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按照起义的战斗布署，二十四师的任务是消灭顺化门、贡院、天主堂和新营房一带的敌人。战斗开始后，尤以天主堂的争夺最为激烈。驻扎在这里的是敌第六军五十七团，战斗力较强。在起义之前，为了摸清敌情，起义军曾派人化装成伙夫三进敌营房，很快弄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和火力配置情况。

起义开始后，我军的枪声一响，敌人便向外突围，但刚到松柏巷，便受到了起义军的伏击。敌人只得龟缩进天主堂内负隅顽抗。敌人在天主堂的钟楼上架起轻重机枪，封锁了松柏巷，由于巷子太窄，无处可以隐蔽，担任主攻的七十一团三营的伤亡很大，不得不暂时撤下来。在危急关头，一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先锋队冲了上去，他们象利剑一样刺向敌人。而另一部战士则翻越城墙，从敌人的侧后方插了过来。在起义军的猛烈打击下，敌人终于抵挡不住了，最后不得不在操场上缴械投降。与此同时，二十四师

七十二团与广东农军密切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了驻扎在贡院一带的敌第三军的两个团。

从起义信号发出，前后约三四个小时，南昌城里的敌人便已悉数被歼。8月1日黎明，南昌市的大街小巷里纷纷贴出崭新的标语：“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威武的工人纠察队也在街头出现，到处飘扬着胜利的红旗。

起义爆发后，起义总指挥部立即派聂荣臻前往南浔线马回岭一带二十五师的部队领导起义。当时二十五师的师长是李汉魂，这个人虽然是张发奎的亲信，但部队中的团、营、连级军官却有许多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周士第当时任七十三团团团长，共产党员孙一中任七十五团党代表。这两个团是由北伐战争时被誉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很强，是该师的中坚力量。

聂荣臻到达马回岭后，立即与周士第、孙一中、张云逸等人商议起义，并决定立刻行动，将部队开往南昌。在党的领导下，驻马回岭的七十三团全部；驻黄老门西南的七十五团三个营；驻马回岭以南的七十四团重机枪连都参加了起义。8月1日下午1时，他们以“打野外”的名义将部队拉出驻地，向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李汉魂此时已得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正在惊惶失措，焦头烂额之际，又闻知驻马回岭的部队也竖起了义旗，便不顾一切地带着五六百人的卫队营乘火车前来堵截。起义军的后卫部队发现后，当即给予他们迎头痛击，张发奎、李汉魂仓惶狼狈而逃，卫队营则做了起义军的俘虏。起义部队终于按原计划胜利地开进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成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敌人因“八一”的枪声而惊惶失措，人民则因这个伟大的时刻而欢欣鼓舞。周恩来在起义胜利后向集合于总指挥部的起义军讲道：“革命想靠军阀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支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了！”

### （三）起义胜利后采取的革命措施

南昌起义前夕，党的前敌委员会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便开始着手拟定一些起义后要发表的文件和文告。在取得起义的军事胜利后，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便全文发表了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22人的联名宣言，这就是著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毛泽东、恽代英、吴玉章、邓颖超、林祖涵、杨匏安、夏曦和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张曙时、屈武等人。这个宣言历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滔天罪行。强调要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但是起义胜利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却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分裂，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也基本上贯穿了这样一条思想。从坚持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提法和做法是对的。

8月1日上午，起义领导机关召开了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联席会议。除了起义的领导者外，还有江苏、顺直、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浙江、上海、湖北、广东和江西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由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接着讨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推选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邓演达、何香凝、林伯渠、彭湃、彭泽民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以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参谋团、总政治部、财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处等机构。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为财务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彭湃、郭亮主持农工运动委员会，张曙、徐特立主持党务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

在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会上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竭力主张把已经公开反共的张发奎等一批反动将领选进革命委员会。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决反对，到第二次发布公告时终于删去了这些人的名字。

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起义军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起义部队仍沿用原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贺龙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第二方面军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清。第二十军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还有军部直属的1个教导团和1个特务营。第十一军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由叶挺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九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主要由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参加起义的警察部队，以及工人武装纠察队与近郊农军组成。后来，第二十五师也归第九军指挥。此外，在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下辖1个直属团、1个手枪营和1个警卫营。这样，一个拥有3万余人，共计16个团又4个营的新型军队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是在革命低潮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8月2日，南昌城里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举行革命委员会的就职典礼。据当时南昌出版的《工商时报》报道：“革命委员会于2日下午1时，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列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振天，诚南昌此前未有之盛况，亦中华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贺龙在会上作了演讲，他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所打断。会场上群情激昂，“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声震撼大地。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奋斗，  
我们牺牲，  
杀向那国际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起义军战士们嘹亮激昂的歌声，化作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心声。歌声犹如惊涛骇浪，猛烈地荡涤着整个旧世界。

同日，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这些文件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尖锐地指出，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是一丘之貉，都是“革命公敌”。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确立革命的根据地，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积极预备实力，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旧军阀等等。这些纲领性的文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主张，特别是强调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爆发的，起义的成功极大地振奋了革命人民的精神，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此，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三、南征广东

#### （一）从南昌到瑞金

南昌起义胜利了，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起义军仅仅是消灭了南昌城里的敌军，起义的胜利也仅仅是向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开始。起义胜利后，南昌城外敌人的力量仍很强大，附近的敌人一两天内就可以到达南昌。张发奎的部队已准备从九江开往南昌，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一线集结他的部队，进行反攻南昌的部署。南京的蒋介石、武汉的汪精卫也都可以迅速集结部队从水陆两路入赣进攻南昌。从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看，起义军是不可能久占四面受敌的南昌城的。因此，迅速及时地撤出南昌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之而来的严峻问题便是，部队撤向哪里，以何处为根据地。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到可以把队伍拉到附近的山区农村，发动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而是想南征回到广东，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后再进行一次北伐，进而统一全中国。当时起义领导人的设想是占领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州、汕头，这样便可以依靠一个海口取得苏联的军火接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起义军制定了南下广东的战略。

在反革命势力进行猖狂反扑的严重时刻，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讨论军事行动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前委决定迅速撤出四面受敌的南昌城，按南征广东的行动方案，立即挥师南下。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决定取道赣东南下，经义乌进入广东。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向广东挺进。

8月的南方，天气异常炎热。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以锐不可挡之势，每天行军六七十公里。不少人的脚上都打了泡，但队伍中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青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周恩来、恽代英、刘伯承、彭湃、徐特立、郭沫若等人都始终与大家走在一起唱在一起。

当起义军出发向抚州前进的途中，发生了蔡廷锴带第十师逃跑的事件。

蔡廷锴的第十师是南昌起义前做为东征讨蒋的部队到达南昌的。这个师有 3 个团，5000 多人，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以第三十团团团长范荇为首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南昌起义前蔡廷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明朗，在 31 日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贺龙曾主张将其扣押起来，后来决定先由周恩来找他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对起义的态度，争取他率部起义。当周恩来找他谈话时，蔡廷锴慨然同意参加起义。这样，第十师便被编入了第十一军。但是当部队从南昌撤出进行至进贤县时，蔡廷锴在其部队中的反动分子的策动下，扣押了以范荇为首的共产党员，之后又将第十师中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遣送出部队，自己则带了队伍逃到福建去了，后来扩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第十师的逃跑，使起义军的力量受到了不小的削弱，原来就不多的部队，由蔡的逃跑一下子又减少了 5000 多人。本来第十师的逃跑是可以避免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说，当时如果调出蔡的第十师两个团分别编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然后再从叶、贺部队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十师，就可以防蔡廷锴率整个第十师逃跑。他认为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前委鉴于蔡廷锴率部逃跑的教训，在起义部队到达抚州后，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撤换了一些不可靠的军官，以保证部队稳定。有些人经不住考验跑掉了，但新的血液仍然不断地补充进来。第十一军政治部的数十名同志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一部分女同志从九江翻过庐山，抄小道，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赶来参加了革命的行列。陈毅于大革命后期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后被派到四川做军阀的工作。当他返回武汉时，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公开背叛了革命，他立即星夜南下，追赶起义部队，最后在抚州赶上了部队，并担任了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三团党代表。

起义军在向瑞金前进的途中，即发现敌军钱大钧部正在集结兵力，以阻拦我军南下。前委遂命令第二十军为先头部队，并以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营，由第九军军长朱德亲自指挥，向瑞金以北 30 里的壬田搜索前进。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敌钱大钧部在此布置了两个团的精锐部队，封锁住了这一要隘。起义军除非把敌人击溃，否则没有别的办法通过。8 月 18 日，前卫营与敌钱大钧部队突然遭遇在壬田，并立刻展开激战。前卫营人数虽少，但在朱德的沉着指挥下，顽强战斗，一直坚持到第二十军主力赶到。敌人虽然只有两个团，但仍拼死顽抗。经过反复冲杀，激战至第二天凌晨，敌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挺不住了，开始向瑞金城溃败。我军趁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了瑞金。南进途中一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十九日，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全部到达瑞金。

南昌起义胜利后，国内反共势力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不但张发奎等国民党新军阀撕下了革命的伪装，公开叫嚣反共，而且各省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也纷纷投向了蒋介石、汪精卫的怀抱。他们扯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到处封闭工会、农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此时党内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却还对汪精卫、张发奎之流抱有幻想，说什么离开了这些国民党领袖，就好比“孩儿离开了娘”。这种投降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部分官兵，在起义军内部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加上在行军途中，沿途的许多农民由于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起义军心存疑惧，很多人躲了起来，往往连粮食都买不到，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而且，由于对起义的意义不甚明了，对

南进途中的艰苦生活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起义军内部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动摇和不满情绪。

针对这些情况，起义队伍到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专门会议，分析当前的形势及部队的思想状况，讨论了建立工农政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没收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纲领，使起义部队的旗帜更加鲜明。同时，为了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增强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前敌委员会决定贺龙以第二方面总指挥的名义向全军印发一份《告官兵书》。

在《告官兵书》中，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明确指出南昌起义“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当前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使命就要实行土地革命”，而起义军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广大士兵，大多数均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所以起义军要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

《告官兵书》还勉励起义军的广大官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暂时困难，鼓起勇气，努力去打倒一切新旧军阀。最后，《告官兵书》再次申明了严明的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并要求官兵们切实执行。

在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在一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告官兵书》起到了振奋军心，澄清思想的作用。它既是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又是鼓舞起义部队，重振革命斗争精神的战斗动员令。

## （二）会昌战斗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军应当由瑞金直趋南下。但是起义部队攻占瑞金后，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得知，敌军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的10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并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的南山岭、城西的寨岭一带构筑工事。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而桂系军阀黄绍竑部约7个团此时也集结于白娥墟附近，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企图堵截起义军。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军领导层内对采取什么样的迎敌策略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认为，必须全力攻击会昌之敌，并力争全部歼灭之；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避免与敌接触，绕道汀洲、上杭而进入广东潮、汕地区。最后大多数人认为，无论实行哪一种方案都必须歼灭会昌之敌，只有这样才能向广东顺利进军。

于是前委决定，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为右纵队，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朱德指挥教导团和第二十军三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之敌进攻；第二十军一师和二师为总预备队，随时策应各方，由贺龙指挥。战斗开始前，前委向全军官兵指出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要求部队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占领会昌。

24日早晨，朱德指挥的左纵队经过一夜的强行军首先到达会昌城东北10余里处的高山一带，并随即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利用有利的地形，顽强地抵抗着起义军的进攻。

由于二十五师深夜从瑞金出发时走错了路，右纵队只有二十四师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于到达后迅速投入了战斗。因二十五师没有能按时赶到指定位置，朱德指挥的左纵队便承受了敌人的很大压力。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由周逸群任师长的第三师，其成员大都是工运

或农运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是非常勇敢顽强。当时任一营营长的陈赓，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左腿，虽身负重伤却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表现出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艰苦战斗有利地支援了其他部队的行动。

到中午，第二十五师赶到了。叶挺向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介绍敌情后，命令他们迅速投入战斗，夺取会昌城西北的高地。会昌城西北的几个山头是会昌的天然屏障，会昌城的得失，取决于这几个山头的得失。敌人在这里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很强的兵力和火力。我军七十三团官兵，以当年“铁军”攻打武昌城的顽强战斗精神，向敌人的阵地反复冲杀。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攻下了敌主阵地，敌人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会昌城内溃退，起义军乘胜渡过贡水追击残敌。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歼战，在起义军的穷追猛打下，守城之敌全线崩溃，大批敌军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下午4时，起义军胜利攻占会昌城，敌首钱大钧连自己的轿子都来不及带走，便仓惶向南逃窜。

会昌战斗，起义军获得了胜利，共消灭敌人4个团，俘虏敌官兵9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件，以及大批辎重物资。但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也伤亡了800多人。

会昌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威风，进一步扩大了我党及起义军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传播了革命真理，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

起义军攻克会昌后，立即全军回师瑞金，在瑞金进行了3天的休整。恽代英代表前委向部队介绍了彭湃领导的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的力量和声势，以及部队准备绕道福建去东江的计划，再一次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打到广东去，实现第三次北伐。

### （三）挺进潮、汕

9月1日，起义军离开瑞金，绕道福建，开始向潮、汕进发。

9月3日，部队到达福建汀州。

起义军在壬田和会昌两次战斗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多官兵负了伤。加上天气炎热，长途行军和水土不服，部队中的伤病号问题日益严重。当时汀州有一所外国人办的福音医院，“五卅”运动后，外国院长跑了，医生和职工们便推举一位名叫傅连璋的中国医生当了院长。傅连璋虽然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关心、同情北伐革命，听说起义军要来汀州，他便和城里的医生约好，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临时合组医院。起义部队到达后，这些医生利用极其有限的治疗手段，为部队中的伤病号治疗病伤。大部分伤员和病号经过治疗都重返部队。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的陈赓和革命老人徐特立，都是经傅连璋的治疗才得以康复的。傅连璋后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中著名的医生。

起义军在汀州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向潮、汕进发。在如何夺取东江的问题上，起义领导机构内部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最后即可控制整个东江地区。至于潮州、汕头，则应以小部分兵力去攻取，那时预料敌人会因失去东江而恐慌，潮、汕势必空虚，完全有可能不战而取。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以主力军攻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的敌人。攻取潮、汕后，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夺取惠州。这种意见的根据是，如果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取得，便可取得海上的接济，且梅县、兴宁、五华一带都是山路，部队不便行动，给养也会发生困难。而走三河坝到潮、汕，可以顺韩江而下，水陆并进。

由于部队自南昌出发以来，长途征战，已十分疲劳，都想得到休息，因此，大多数人都赞成后一种意见。部队最后按照后一种意见向潮、汕进军。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梅县一带虽是山路，但也是往东江地区发展的制高点，从梅县、兴宁、五华取惠州及潮、汕，一路是俯攻之势，居高临下，敌人难以防守，而且由此路线抄近路到达东江，会使敌人猝不及防，难于快速集结部队。至于给养，后来才知道，也并不困难。

而实行了后一种意见，起义军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失败的道路。首先在三河坝分兵，使兵力不集中，给敌人各个击破我军造成了有利条件；到达潮、汕后再向北从揭阳出击，行动过缓，使敌人得以集中兵力，以逸待劳，而且从潮、汕向北，一路均呈仰攻之势，使我军的进攻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会昌战斗胜利后，未按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乘胜追击，全歼敌人主力于筠门岭一带，直下寻坞、梅县，已是失着。汀州会议又未能按照正确意见抢先去占领松口、梅县、兴宁、五华一线的高地，以至造成了以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形势。

9月14日，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部队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向着既定的目标——潮、汕进军。朱德当时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向三河坝进军。而这时起义军中东江籍的战士在彭湃的率领下，已先行从汀州直捣东江。由于大革命时期彭湃在东江地区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到来使这一地区被国民党反动派打入地下而蕴藏起来的农民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大埔、松口等地的工农讨逆军这时也重新活跃起来，积极配合起义军，向敌人发起进攻。三河坝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缴了当地敌人的枪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起义军顺利占领了韩江上游的大埔、松口、三河坝等地。

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的农民军于九月十日占领海丰，围攻陆丰，9月24日夺取海澄，包围普宁。在农民暴动声中，起义军直逼潮、汕。

潮、汕是潮州和汕头的简称，位于广东东部沿海。著名的韩江流经潮州注入南海，韩江三角洲西侧便是汕头，潮汕铁路把这两个地方联结起来。由于汕头是一个优良的港口，1858年英帝国主义便通过与清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将其定为对外通商口岸。

当起义军大军压境时，潮、汕的工农群众里应外合，积极呼应。铁路工人为了阻止敌人调兵，扒了铁路。工农赤卫队占领了各警察署及其他重要机关。他们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且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资本家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准备去香港、广州或上海躲避革命。驻扎在潮、汕的敌军也将枪支、弹药装运上船，准备逃跑。敌人的慌乱动摇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使起义军于23日轻取潮州。之后，起义军沿着铁路工人连夜抢修好的潮汕铁路开往汕头。24日清晨，汕头市区已到处飘扬着红旗。

起义军攻占汕头是南征广东胜利的最高峰，南昌出发时制定的攻占潮、汕，夺取海口的目标实现了。

9月26日，前委在汕头牛屠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都在会上作了演讲。1925年到1926年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曾担任过国



民政府东江地区行政委员，亲自领导过这一地区的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因此，潮、汕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于起义军的到来倍感亲切。

起义军在潮、汕坚定地采取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组织措施，以发展革命势力。起义军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向广大人民群众阐明革命的方针政策；宣布成立国民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宣布原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作废。革命委员会还出版发行了机关报——《革命时报》。为了处理对外关系，革命委员会还任命郭沫若为汕头交涉员兼海关监督。党、团组织这时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他们广泛印发传单，号召青年工农武装起来，镇压土豪劣绅，夺取乡村政权，一时间到处都是武装的工农群众。人民行动起来，以革命的武装去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起义军在潮州、汕头确立了革命阵地后，决定按既定的方案，除部分留守部队外，主力部队向广州进军。并据此在军事部署与前进方向上作出如下安排：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任潮州卫戍司令，并率第三师守卫潮、汕，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第九军及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松口、隘隍、三河坝一带；周恩来及贺龙、叶挺、刘伯承率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师，经揭阳向丰顺进发。目的是夺取梅县，进而西占海陆丰，再进占惠州，最后占领广州。

如前所述，起义军在会昌战斗之后没有听从周恩来等人的正确主张，已经埋藏失败的祸根。潮、汕被克后，由于这一带是低洼之地，根本无险可守，所以不得不把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和第二十师主力留下镇守三河坝一带；而为了守住潮州又留下第二十军第三师。汕头是革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又不得不留下一些直属部队驻守汕头。这样，就分散了兵力，我军主力十五、六个团被分成三部分。原本就显不足的兵力又被分散使用，使起义军最终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 （四）激战汤坑与潮、汕失守

9月27日，起义军主力经揭阳向汤坑进发。当时之所以决定向汤坑进击，是因为占领汕头后，有情报说敌人在揭阳境内的汤坑一带集结了1000多人，准备依仗有利地形进犯潮、汕。于是决定以主力部队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出发攻击汤坑之敌。

当时叶挺、贺龙部向汤坑出击的部队名义是3个师，而实际上，由于错误的分兵方案，这支部队只有6000多人。而敌人呢？会昌战斗我军胜利后，由于没有能够乘胜追击，彻底歼灭敌人，使得敌人得以从容地集聚起钱大钧、黄绍竑、薛岳、陈济棠等军阀部队。当时在汤坑至王华、兴宁、梅县、松口一线的敌人就有2.5万多人，而且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尤其在汤坑一带，敌人更是集中1.5万余人，而不是我军所认为的1000多人。这样就形成了敌军兵力集中，我军力量分散；敌军人数众多，我军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敌人居高临下，我军仰攻，敌军以逸待劳，我军长途奔袭人马疲惫等这些军事上的不利形势。

按预定方案，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军一师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向汤坑挺进，第二十军二师为后续部队。9月28日，第二十四师在距汤坑30里的地方与敌薛岳部第三师遭遇，在击溃敌军后，部队在汤坑附近宿营。

29日拂晓，我军主力在贺龙、叶挺指挥下向汤坑之敌发起了总攻。战斗

中，起义军官兵奋勇向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迫使敌人退到一个高山上，凭险顽抗。我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奋勇冲杀，冲上了山头，顽抗的敌军又退到了另一座山头。这时敌人钱大钧、黄绍竑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了，敌人利用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继续顽抗。我军虽向敌阵地反复冲杀十几次，但仍未能攻下这座高地。此时天已渐黑，而且双方伤亡都很大，不得不停止战斗。

当天夜里，起义军组织了突击队夜袭敌人阵地，但是没想到狡猾的敌已有所准备，设下了伏兵。遭到敌人伏击的第二十四师夜袭部队虽奋勇反击，反复冲杀，但仍受到巨大损失，大部分被敌吃掉，只有少数官兵突围撤回。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军主力已损失一半，弹药也已消耗殆尽，而敌人的增援部队还在陆续到达，不得已，起义军只好退出战斗，向揭阳方向撤退。

30日，起义军退到揭阳，不久便得知潮州和汕头失守。潮、汕既已失守，揭阳也必不保，起义部队即从揭阳撤出，向海陆丰方向撤退。10月3日，当部队行至普宁县境内流沙附近一个叫乌不的地方时，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大股敌人的伏击。敌人利用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将起义军部队拦腰截断，并包围了第二十四师。二十四师的战士们虽奋勇拼杀，仍不敌敌人。这场战斗部队损失惨重，只有少数人突围出去，到了陆丰。第二十军一师和二师的部队虽然冲过了乌石，但在即将到达海陆丰时，被敌人打散，部队损失殆尽，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突围了出去。至此，起义军主力的南征计划失败了。

当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与敌人激战时，敌人在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开始向潮、汕进攻。9月30日，敌人两个师的兵力沿韩江左岸进犯潮州。当时驻守潮州的是二十军三师的一个团，为了抵御敌人，起义军选择潮州城北、韩江上游、竹篙山、飞鹅山为阵地，构筑工事。上午10点，战斗打响，敌人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整队向山地冲锋。起义军战士非常英勇，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到下午三、四点钟，敌人一面继续从正面攻，一面以部分兵力绕到潮州城西南的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与汕头的联系，使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起义军战士仍然奋力与敌激战。在敌人的猛烈火力和轮番进攻下，起义军大部分战士都牺牲在阵地上。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不得不撤退。冲出敌军包围后，一部分部队向韩江上游进发，计划与三河坝方面的部队会合；另一部分则退到普宁，计划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这部分部队后来又在行动途中陷入敌人的重围，几乎全军覆没。

30日，潮州失守。

在潮州失陷前，9月29日，国民党军队就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支援下，开始向汕头进攻，但被我驻守部队打退。30日潮州失守后，汕头失去了屏障，形势已开始极度恶化。国民党军舰在帝国主义强大舰队的掩护下，开始以强大的火力向汕头我军射击。陈济棠、钱大钧等部敌军也从四面八方向汕头袭来，猛攻汕头。在这不利的形势下，前委决定放弃汕头，向海陆丰撤退。汕头遂告失陷。

10月4日，起义军领导机关撤退到普宁县流沙村，并在这里召开了现有起义军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面对战局不可改变的形势，前委决定，今后要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将现有的武装人员尽可能地集中，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人员则愿留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就地分散。同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物色一些当地农会友作为向导，为起义领导人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去香港或上海作准备。当仅存的部队正在贯彻前委的决定时，敌人又再次来袭，

起义军随即被敌人冲散。其中一部分后来到了海陆丰，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

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根据分散行动的方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叶挺等人乘一叶扁舟前往香港。随后不久，贺龙、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汇、恽代英等起义军领导人也先后到达香港。过了一段时间，根据党的指示，除周恩来须在港继续治疗外，其他人均陆续返回上海，向中央报到。后来，叶挺、恽代英、彭湃等南昌起义领导人，又在1927年12月与叶剑英、张太雷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

### （五）三河坝苦战与井冈山会师

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后，朱德奉命率第九军和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溜隍一带。三河坝在大埔县境内，是这一地区的统称，它的中心是汇城。南昌起义时朱德任副军长的第九军，由于起义军仓促撤出南昌，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只有军官教育团的几百人和一部分原南昌市警察局的一些人。因此，驻守在三河坝一带的实际上只是第二十五师的部队。

朱德率部队到达汇城后，利用有限的时间使起义军得到了休整。过了10天左右，得悉敌钱大钧部集结了3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三河坝。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朱德命令部队——星夜出发，在韩江岸的笔支尾山顶一带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这时敌钱大钧部约2万多人已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10月1日午，战斗打响了，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射击，起义军则以虚避实，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并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弹药。

战至第三天拂晓，突然天降大雾，茫茫雾气笼着河西，滩头和山林，能见度极差。敌人利用大雾掩护，组织了众多的兵力进行强渡，起义军虽顽强抵抗，但仍无法阻止敌军，不得不放弃滩头阵地，退到山地，并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与敌一直相持到下午。这时，敌调集了大量的机枪、火炮，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再次发动猛攻。在与敌激战3昼夜、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二十五师的战士们发扬“铁军”的战斗作风，仍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由于敌众我寡，朱德与部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于这时还不知道南征主力已经失败，潮、汕已经陷落，部队仍计划沿闽粤边境向潮、汕转移，与主力部队会合。当部队行至广东饶平时，遇到了从潮、汕方向突围出来的第二十军残部数百人，这才知道潮、汕已失守，我军主力已被敌人击败。于是决定将伤病员交给地方党组织分散安置，然后开始向福建、江西转移。

起义军主力南征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的2000多人三河坝突围部队便成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较为完整的武装力量，因此也就成为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围堵截的最主要目标。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朱德和陈毅领导部队且战且退，最后退至江西境内。

这支部队的行踪很快被军阀部队发觉了，敌人派出了1个师兵力紧紧追赶，沿途的土匪和地主武装也不断进行骚扰和袭击。敌人的骚扰和袭击使队伍中的一些人倒下了，还有一些人在混乱中跑散了。因此，进入江西后，这支队伍只剩下1000人左右了。

当时从全国形势来看，革命处于低潮，而起义军这时又遭到严重的失败，部队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混乱。每个人都在想：我们这样一支孤军，既无供给，

也无援兵，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呢？

为了提高干部战士的觉悟，使大家认清形势，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坚定革命信念，提高部队的士气，当部队行至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召开了全部队排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后来回忆道：“当时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有人问，反革命军队整天在后面追我们怎么办？朱德回答道：“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起义军官兵们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革命信念。

这支四面受敌，得不到后援的队伍，生活极端艰苦。10月的赣南山里天气已很寒冷，而官兵们身上还穿着南昌起义时发的早已破烂不堪的单衣。他们忍受着寒冷、伤病和饥饿的折磨，顽强地向西挺进着。有些人忍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开小差逃跑了。10月底，当部队到达江西大余时，从三河坝出发时2500人的队伍，只剩下了800多人。这些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但他们是经过烈火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革命的火种。面对这样队伍，朱德充满信心地说：“我原想有200人同生死，就能胜利。现在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

11月初，朱德率领部队在湘、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岭山区开展起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也就在这时，他们得知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和农军，在井冈山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这个消息大大地鼓舞和增加了部队的勇气和信心。

从广东撤退后，一直是边走边打，人员变化很大，原来的编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于是到江西崇义时，便根据现有人员，将部队整编成一个纵队，以朱德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对外仍称国民革命军。当时部队装备极差，供给也不足，只有两挺机枪，还有一挺是没有腿的。这时朱德又一次利用其在滇军中的声望，与驻在广东韶关的滇军范石生部拉上了关系，挂上了范石生第十六军第一四团的番号，朱德任团长，化名王楷，驻守在韶关附近的犁铺头。朱德以其大智大勇，为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和装备供给，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实力，为后来发动湘南“年关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部队隐蔽身份，在犁铺头休整时，传来了广州起义的消息。朱德便率部向仁化方向前进，其目的是从那里渡河去东江，与广州起义军会合。但是广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前去会合的目的既然不能达到，部队便折回向北、向湘南进发。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等人率部队占领宜章县城。在党的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暴动（也称年关暴动），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在湘粤交界处的砵石、乐昌一带消灭了许克祥部的两个团，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起义军还在当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在湘南一带顿成燎原之势，起义军很快便扩编为2个师8000多人。1928年4月

湘南起义失败后，朱德等人便率这支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进发。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一直十分关注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曾多次派人下山寻找起义部队。1927年12月，何长工在犁铺头找到了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朱德请何长工带信给毛泽东，准备发动湘南起义后即率部去井冈山会合。湘南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的队伍，分两路插向湘东南，接应、掩护起义部队，使起义军得以顺利到达井冈山。

何长工在《伟大的会师》这篇回忆录中，对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有很生动和详细的描写：

“快走近村边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他们自己道了姓名，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我们都感动地站在旁边，笑着，看着他俩。”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相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到处是一片朗朗的笑声。”

随着两双伟大的手的相握，中国革命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1928年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布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进入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时期。

## 四、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及其伟大意义

### （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

南昌起义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从客观上看，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起义军处于既无外援、又无内应的境地。但从主观上看，似乎有着更多的失误。

首先，起义胜利后迅速撤出南昌城是正确的，但是随后做出的南下广东、夺取潮、汕，然后经海陆丰到惠阳，最后夺取广州，实现第二次北伐的计划，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条错误的路线导致了起义军的最后失败。

这个计划的着眼点没有在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想通过北伐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已是不可能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革命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如果当时没有南下广东，而是从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农民群众；或者就在江西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其次，起义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起义胜利后却没有对参加起义的旧式部队进行改造。当时参加起义的部队除叶挺部和第二十五师中的一些部队党的基础较好外，其他部队党的力量均较薄弱。多数起义部队对起义的目的并不明确，甚至一些部队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参加起义的。最明显的就是蔡廷锴的第十师。蔡原是陈铭枢的部队，是因为怕被张发奎吞并才加入到起义部队中去的。虽然起义领导人对他参加起义的诚意也有所怀疑，但是对他的部队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至使他在离开南昌第二天便背叛了起义军逃到陈铭枢那里去了。还有在汤坑之战失败后，本来贺龙部队还有2000

余人，但是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改造，结果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敌人，贺龙几乎是单独逃出的。

第三，没有广泛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义军虽然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但是由于在前敌委员会中一直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存在争论。因此在实行中停留在“没收 200 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的口号上。而在当时，特别是在南方，拥有 200 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并没有多少，所以起义军所到之处并没有使广大农民得到任何好处，使军事行动难以同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真正结合起来。

## （二）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南昌起义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

首先，南昌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是我们党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当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投入血海，使革命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独立地组织武装起义，向敌人的白色恐怖发起了英勇的抵抗，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和工农群众进行斗争的新篇章。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两个不同阶段的转折点，中国革命由此迈出了划时代的步伐。

其次，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我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33 年 7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 年初，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制作我军军旗时要有“八一”两字；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以“八一”字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八一”南昌起义，人民军队从无到有，武装斗争的经验也是从无到有。南昌起义所点燃的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经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沿着井冈山的道路终于燃成了最后埋葬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之火。

“八一”南昌起义这一伟大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八一”南昌起义中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之革命精神，将万古长存！

### 参考书目：

1. 《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7 月。
2. 《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7 月。
3. 《南昌起义史话》，胡华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8 月。
4. 《中国现代史（上）》，魏宏运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0 月。
5.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 6 月。

